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题研究

温儒敏 赵祖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

ISBN 7-301-05338-X

I. 中… II. 温…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693 号

书 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著作责任者: 温儒敏 赵祖谟 主编

责任编辑: 高秀芹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338-X/I·058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mm × 1168mm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9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前言 (1)

第一讲 鲁迅研究四题 (1)

一、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 (2)

二、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人? (8)

三、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思考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重新
关注? (13)

四、如何理解鲁迅的《呐喊》《彷徨》在现代文学史上的
崇高地位? (18)

第二讲 关于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 (24)

一、如何消除经典阅读中的历史隔膜? (25)

二、知人论诗读《女神》 (34)

三、郭沫若研究概况 (39)

第三讲 茅盾研究中的“矛盾” (44)

一、茅盾研究概况 (45)

二、茅盾的文学主张 (49)

三、《子夜》分析 (54)

四、茅盾的艺术风格 (61)

第四讲 老舍创作的视点与“京味” (70)

一、如何理解老舍“市民世界”的文化反思 (71)

二、《骆驼祥子》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探讨 (78)

三、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幽默	(81)
第五讲 曹禺与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	(87)
一、曹禺研究概况	(87)
二、曹禺话剧的诗意特征	(93)
三、曹禺话剧艺术的其他几个特征	(98)
四、对几个有争议的戏剧人物的艺术剖析	(102)
第六讲 沈从文与“京派”文学	(110)
一、关于“京派”	(111)
二、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与城乡对照的两个文学世界	(116)
三、介绍一些关于沈从文研究的主要著作	(123)
第七讲 张爱玲的《传奇》与“张爱玲热”	(127)
一、《传奇》的评析	(127)
二、张爱玲的艺术“创新”与“袭旧”	(134)
三、“张爱玲热”与张爱玲研究状况	(143)
第八讲 穆旦与九叶诗派	(154)
一、新诗发展的历史轮廓	(154)
二、九叶诗派的聚集、资源与艺术成就	(159)
三、穆旦诗歌的艺术创新及其文学史地位	(164)
第九讲 现代散文五家	(180)
一、周作人的“言志”散文	(184)
二、“冰心体”与朱自清的抒情文体	(192)
三、郁达夫的行旅散文	(197)
四、何其芳的“独语体”	(200)

第十讲 赵树理评价问题与农村写作	(204)
一、“赵树理方向”是怎样构建出来的	(204)
二、在褒贬毁誉之间	(211)
三、对赵树理的再评价	(218)
第十一讲 “样板戏”及对它的评价	(223)
一、如何看待江青对样板戏的作用	(224)
二、专业工作者和观众对“样板戏”的影响	(230)
三、“样板戏”的艺术成就	(234)
第十二讲 朦胧诗及其叙述	(240)
一、朦胧诗的“朦胧”引起的论争及其意义	(242)
二、朦胧诗的文学史叙述	(247)
三、朦胧诗的发展和变异	(254)
第十三讲 汪曾祺与当代小说文体	(261)
一、汪曾祺小说的审美世界	(261)
二、汪曾祺的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274)
第十四讲 王安忆与女性写作	(284)
一、女性写作：对一种文学现象的整体描述	(284)
二、女性写作的三次高潮	(286)
三、王安忆的写作描述	(293)
第十五讲 王朔现象与大众文化	(315)
一、王朔现象带给批评界的挑战与争论	(315)
二、社会转型与大众文化的勃兴	(316)

4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三、王朔作品的大众文化特征	(320)
四、如何阅读与评价王朔作品	(323)
第十六讲 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变化	(332)
一、余华与先锋小说的悲剧性命运	(334)
二、余华在细雨中无声的呼喊	(341)
三、先锋小说家的“胜利大逃亡”	(347)

前 言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是一门带有研究性质的课程,共16讲,涵括了现代和当代两大部分。这门课是为已经学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基础课的同学设计的。基础课主要学习有相对稳定性的知识,这种专题课则要深入一步,就一些比较集中的课题,让大家了解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向,包括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同时通过对课题中某些方面的重点分析,引发对不同研究角度与方法的探讨,从而拓展我们批评和鉴赏的眼界,学习如何评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也许还有一个很实际的目标,那就是引起同学们对某一研究课题的兴趣,或者可以从中找到做毕业论文的题目。

这十六讲并非对现当代文学的全面评述,但选题也是有教学上的考虑,即通过重点作家作品的分析,以点带面,将“文学现象”的考察“带”起来。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也应当“以点带面”,充分运用以往学习过的文学史知识,从文学潮流发展变化的历史联系和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去讨论某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原由,去评判作家作品的得失。对于当下发生的文学,如果我们学会运用相应的文学史眼光去考察,尽可能从文学历史发展的坐标中来衡量其得失地位,也可能是有利于增加理解的深度的。当然,推展开来看,这种带研究性的学术训练,多少也就可能使我们的文学感悟力,以及分析概括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了。即使我们所从事的是文学以外的其他的工作,这种由初步学术训练而带来的眼界的拓展与能力的提高,对我们仍可能是获益匪浅,毕生受用的。所以,我们学习这种研究性的课,尤其要注重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学术体验和能力训练方面下功夫,而

不只是瞄准考试,死记一些答案。

这门课的每一讲都讲到一些重点的作家作品。如果想提高对作品的分析评判能力,光是阅读课文,或者只是听老师讲课都是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要阅读作品,而且必须是在听课之前先读过作品,有自己的第一印象和感受,最好还能同时读一些相关的评论和研究的成果。每一讲都多少介绍了有关的研究状况,有的还提供了基本的研究书目。我们正好可以顺藤摸瓜,找一些研究论著来参考,从中或许就可以得到某些启发,帮助我们进入研究状态,找到自己进一步探讨问题的空间。每一讲后面还设计有思考题,也是为了引起研究的兴趣,训练文学史眼光和鉴赏分析能力,当然,也可以帮助复习。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门供本科生选修的课叫“现当代文学作品赏析”,通常由七八位老师来“抬课”,每位老师讲一两个作家作品,而且各个老师治学和讲课的风格不同,研究和鉴赏的角度方法也可能会有差别,让同学们领略不同的学术风貌,知道文学作品原来是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和方法去理解的。这很自然就改变了同学们原来可能比较单一的“语文应试式”的阅读习惯,而拓展了把握和分析文学现象的视野。同学们都很喜欢这门课。我们现在开讲的“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大体上就是仿照北大的“作品赏析”课,稍多一些研究的色彩。主讲人也大都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参加教材的编写的有教授和博士,他们做如下的分工:

温儒敏(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前言、第一讲、第二讲、第四讲、第六讲、第七讲第三节;

黎荔(北大中文系博士生):第三讲、第五讲;

李宪瑜(北大中文系博士):第七讲一、二节、第九讲;

姜涛(北大中文系博士生):第八讲;

赵祖谟(北大中文系教授):第十讲,第十一讲;

李平(中央电大教授):第十二讲,第十六讲;

高秀芹(北大中文系博士):第十三讲,第十四讲,第十五讲。

温儒敏和赵祖谟负责这本教材基本框架的确定和全书的统稿。

本书原为内部讲稿,因作者水平有限,汇稿时间匆促,肯定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为满足教学的需要,现作为教材出版,希望得到同行专家的指正,并能在教学中征得同学们的意见,以期再版时修改和完善。

本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曾经过专家小组的审议论证。他们是:钱理群、谢冕、洪子诚、吴福辉、孟繁华,特向他们表示感谢。

2001年11月18日

第一讲 鲁迅研究四题

鲁迅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因为鲁迅所提供的精神文化资源是那样丰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发掘、理解与诠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经典的魅力。也因为鲁迅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象征。在文化转型期艰难的探索中,鲁迅独异的文学想象,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和思考,都给人深刻的启迪。鲁迅不是优雅的、平和的、休闲的,而是真实的、严峻的、深邃的。从“生活化”的立场也许人们并不“喜欢”鲁迅,但不能不承认,鲁迅的确是我们民族历史与现实最清醒的观照,是可以不断引发问题意识的思想动力源。

据说,英国人宁可失去英伦三岛,也不能不要莎士比亚。这是形容一种文化象征的极端重要性。英国人,乃至许多西方人,已经把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当做民族精神的依持,当做可以生生不息地解读各种基本文化命题的精神源泉。鲁迅对于我们民族的现代文化,也有类似莎士比亚之于西方文化的经典价值,而且鲁迅的影响是更为现实的。在当下这样一个价值标准比较混乱,民族精神的重构面临极大挑战的时期,我们需要加倍珍惜鲁迅这份精神遗产。特别是文科的学生,如果没有读过几种鲁迅的书,不了解鲁迅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价值,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在专科阶段,现代文学史已经介绍过有关鲁迅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这里有针对性地谈谈鲁迅研究与评价的几个问题,并就鲁迅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

这里先围绕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并针对当前有些试

图解构或误读鲁迅的看法,提出四个问题来讨论:一是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二是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人?三是鲁迅对现代化的思考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关注?这三个问题是主要的,专科阶段可能关注较少,这里多讲一点;最后,第四,顺便再谈谈鲁迅小说的文学史地位问题。这些都不是新的问题,以往很多学者都已经讨论过。不过我们这里更关心的是,鲁迅在这几方面如何表现出他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的深刻的思考,他的独特的探求,还有不容忽视的他的焦虑。鲁迅前后期的思想是有所变化的,但面对文化转型所表现的基本态度,包括对传统的攻打与传承,对国民性的分析批判,以及对现代化的思考与担忧,都贯彻始终,有鲁迅自己的特色。毫无疑问,鲁迅是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伟大哲人和战士,他的思想不是书斋式的或体系式的,而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痛苦而切实的摸索,带有对传统得失的深刻感悟,对国情民性的透彻理解,又渗透着独到的人生体验。今天我们仍常谈现代化、现代性,其实可以从鲁迅这里获得宝贵的思想资源,包括他的探求,他的体验,他的焦虑。问题是必须用更多历史的同情和理解,认真地知人论世地读一读鲁迅的原著,祛除对鲁迅的隔膜与误解。

一、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

近十多年来,国内有些人,海外也有些人,对鲁迅有很多批评,甚至否定。这的确和以前神化鲁迅的局面很不一样。人们也许仍然很腻味把鲁迅作为宣传的工具,试图颠覆神化,让鲁迅回到人间本位,从这一角度看,可以理解,也比较正常。过去是不可能对鲁迅有批评的。鲁迅当然并非完人,他的创作和思想也有得有失,不是不能批评。但批评应实事求是,讲求学理性。比如,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鲁迅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不占有什么地位,因为鲁迅毕生攻击、贬低民族传统文化,丑化中国人,附和了激进的思潮,使传统文化在

“五四”断裂,丧失了民族的自尊、自信。客气一点的,则认为鲁迅对传统的批判也许有其理由,但问题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甚至认为“五四”以来风行激进主义,对传统猛烈批判,全盘否定,结果割裂了传统,伤了元气,而鲁迅便被指责为全盘否定传统的一个代表。

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无根据。近百年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鲁迅的确是对传统文化批判最深刻、攻打最猛烈的人之一。如果和同时代一些先驱者相比,这也很明显。比如胡适,他也从反传统入手,建设新文化,但态度较中和。他那篇暴得大名、为新文学运动发难的《文学改良刍议》,就还是商量商量的“刍议”。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批判传统的“非人”文学,也一度表现坚决,但很快就又与传统接上了“气”,大讲新文学如何与“晚明的传统”血脉相通,循环再现。^{〔1〕}梁实秋更是直接批评“五四”新文学的激进、浪漫,失去了基本的规矩。^{〔2〕}相比之下,鲁迅对传统的确是严厉批判,是决绝的态度,甚至很偏激。最典型的,也是大家熟悉的,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文明高度概括和比喻为“吃人的筵席”,而传统中国就成了“安排人肉筵席的厨房”。狂人晚上睡不着,翻开历史书,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看到的只有两个字:“吃人。”这当然是一种小说的形象表现,不是逻辑判断,但其中有鲁迅独特的体验和发现。鲁迅给他的朋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为什么写《狂人日记》?因为偶读《资治通鉴》,才醒悟到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他说自己重视这发现,而知者尚寥寥也。^{〔3〕}《狂人日记》用“吃人”来概括中国传统,主要是一种象征的说法,但的确又是一种猛烈而深刻的批判,是极带义愤的攻打和否定。在“五四”时期,鲁迅一谈到旧文

〔1〕 可参阅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9月人文书店出版。

〔2〕 可参阅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发表于1926年3月25日《晨报副刊》,收《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3〕 见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3页。

化旧制度,往往深恶痛绝,有时把话说得很“绝”。他甚至曾经用这样义无反顾的语气来表示:“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凡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1]

不能否认,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鲁迅的确常采取与惯常思维不同的逆反评判。这可能让人震撼、惊愕,虽然不习惯却又顿觉清醒,思路别开生面。一些我们引以为荣的事,到了鲁迅那里,却可能又有新发现,有入骨的质疑。如雍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一般认为是伟大的文化建设积累,盛世修史,有大的气魄。这是通常的评价。从文化史的角度看问题,也有其道理,大家都接受。但鲁迅不以为然,把此举视为一种“文化统制”,是“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棘手的一种”。^[2]鲁迅要揭示的,是“历史的阐释权”在造就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文化传统方面所起的作用。鲁迅认为官修史书往往把历史上的真实抹去了:明人刻古书而古书亡,清人修四部全书而古书亡,在他看来,这就是所谓篡改历史,强迫遗忘。因为鲁迅对传统首先采取的是怀疑的态度,他常常另辟一种眼光,透入历史的本质去重新思考评判。鲁迅有意用这种逆反式的评判去警醒人们,挣脱被传统习惯所捆绑的思维定势,揭示历史上被遮蔽的真实,正视传统文化中不适于时代发展的腐朽成分。

如果不领会鲁迅的这种批判的意图和姿态,就可能以为鲁迅太片面和绝对。鲁迅最为一些人所“诟病”的,是他甚至主张不要读中国书。在《青年必读书》(1925)中,鲁迅这样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时时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

[1] 《突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

[2] 《买小学大全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57页。

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光就这言论来看,不无道理,的确又很绝对。问题是如何理解鲁迅说这些话时的“语境”。鲁迅是针对“五四”落潮后,那些重新要提倡尊孔读经的思潮,而提出要“少看中国书”的。其中也蕴涵有鲁迅对中国书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整体感悟,特别是对那种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的反感。这是杂文笔法,一种批判式的情绪的表达。传统文化当然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宜笼统褒贬,但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严重牵绊着中国社会进步时,在旧的思想与伦理道德仍在事实上占统治地位、如同罗网束缚人们的自由和发展时,要冲破传统的“铁屋子”,觉醒奋起,就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态度,大声呐喊。这大概就是“五四”启蒙主义往往表现得有些激进、有些矫枉过正的历史理由,也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常见现象。我们当然也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鲁迅。而且从实际内容看,鲁迅所反对和坚决批判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封建性、落后性东西,是专制主义制度和文化,包括“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以及种种使国民精神愚昧、麻木、迷信的那些糟粕。要剥掉这些缠绕在我们民族躯体上鳞甲上千年的沉重的旧物,若没有果断的措施和决心,恋恋不舍,优柔寡断,那谈何容易。要理解鲁迅所处的那个年代,是中国正受外敌入侵、挨打的时代,处于“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又仍然在严重地禁锢民族的精神,麻木灵魂,消解活力。一面是保国保种的焦虑,一面是“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腐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2〕}难怪“五四”以后,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和现代作家都那样感时忧国,恨不能尽快摆脱传统,激活民族的生命力,摆脱国家的危机。在这种情形下,鲁迅为了警醒人们,当然最好是大声疾呼,用决绝的而不是温温吞吞的态度立场,去告别旧时代。

〔1〕《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2〕《突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44页。

这样,有时他就难免要表现为“有意的偏激”。所以,“吃人”也好,“不读中国书”也好,这种急需突破传统的态度,即使有些偏激,也是符合那时代变革需要的。不能离开特定的语境,摘出一些句子,就来否定鲁迅。要看其所持立场以及发言说的基本的精神指向,不能脱离时代地分析。

现今批评鲁迅“激进”者,指责最甚的便是鲁迅“全盘否定传统”。而不同意这种指责的,便可能为鲁迅辩解,完全否认鲁迅对传统是全盘否定。其实,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整体评价来看,从其坚决反对折衷调和的立场来看,说是“全盘否定传统”,也是事实。鲁迅并不讳言自己反传统之激烈、绝对,乃至全盘否定。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衷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1〕}这当然是一种策略。封建传统如此根深蒂固,“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如果不用全盘否定式的彻底决裂的态度,如果一开始就总是强调“因时制宜,折衷至当”,那势必被调和折衷的社会惰性所裹挟,任何改革都只能流于空谈。正是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传统这个意义上,我们高度肯定鲁迅对于现代文化转型的价值,肯定他在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策略层面上的整体估价是一回事,在操作层面上,对文化遗产具体的研究整理又是一回事。我们也不应当简单的断言鲁迅就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更没有理由指责鲁迅割裂了传统。鲁迅绝非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如何为民族文化寻求新的出路这一点上,鲁迅有其明确的主张,那就是,对于传统一要批判,二要继承,三要转化。鲁迅这种分析的态度,是一贯的。早在1907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就指出,民族文化应与世界潮流会合,

〔1〕《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3-14页。

应更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这里就有对转型的精辟的理解，意思是择取传统文化中好的优秀的成分，融合外来新思想和良规，创立新文化。所以，鲁迅同时在做两方面工作，一是批判、攻打、破坏；二是梳理、继承、创新。因为是文学家，鲁迅在创作中更多表述一种情感、精神，对传统的批判表现得很决绝，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此外应该看到，鲁迅还有作为学者的冷静和严谨的一面。他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又用大量精力认真整理、研究、分析传统文化遗产，发掘其中那些仍有活力、可资借鉴、可能实现转型发展的成分。为了说明鲁迅这种认真，说明他对传统的态度还有传承拓展的另一面，也可以举些事实。鲁迅用了差不多30年（大部分）的时间，整理了22部古籍，包括《嵇康集》、《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他收集过大量古代的碑帖、拓片，曾试图写一部中国书法变迁史。他在北大等校上课并写出《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讲稿和著作，其中有些已经成了古代文化研究典范性的学术成果，其研究的某些方法、命题和概念，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学术界广为采用，影响巨大。鲁迅自己的创作也从传统文化中吸纳丰富的养分，特别是与“魏晋文章”的风格一脉相承。据孙伏园回忆：刘半农曾送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对此也默认。^{〔2〕}可见，鲁迅攻打传统，但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或可以割断传统。鲁迅对传统所采取的是分析的态度，他的褒贬鲜明，常有独到眼光，绝非不负责任地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倒掉。例如，鲁迅指出传统文学中常见的“大团圆”、“十景病”，认为其功用就是粉饰现实，制造瞒和骗的大泽。“中国人因为想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

〔1〕《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

〔2〕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

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1〕}这批判是够激烈的了。但鲁迅对传统文学也并非一概否定。在大学的讲坛上,在他研究小说史的专著中,他都发现和肯定了古代文学许多优秀的值得传承和借鉴的成分。如对《红楼梦》鲁迅就非常赞许,认为其“敢于如实描写,并无伪饰”。^{〔2〕}鲁迅所肯定的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手法。要看到,鲁迅既是对传统激烈的批判者,同时又是对传统最有见地的解释者,他在对传统的解释中发现与肯定有利于新文学新文化的东西。用现今的说法,就是所谓“价值重估”,即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对传统重新评析、判断和批判继承。其实,和鲁迅同时代的人,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等,对传统批判都曾经表现得相当激进,甚至是全盘否定,以求冲破旧文化的惰性,但他们毫无例外又都在研究、整理、评判传统文化方面做出开拓性的巨大成绩。怎么能轻易断言鲁迅和“五四”的一代“割断”了历史,并指责他们只是传统的破坏者呢?

二、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人?

现今读鲁迅杂文和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对国民性的猛烈的批判。有的人可能并不了解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的具体内涵,也不了解鲁迅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这种批判,所以直观地对鲁迅的批判方式反感,不能接受,甚至担心会丑化了中国人,伤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还有人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是按照西方人的眼光诊断中华民族的精神疾患,客观上印证了西方征服东方的合理性。鲁迅的确毕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其实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实现文化转型的切要的工作。他的小说、杂文,时时

〔1〕《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40-241页。

〔2〕《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38页。